



明清

# 佛教发展新趋势

发展新趋势

黄海涛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黄海涛  
著

明清  
**佛教**  
发展新趋势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黄海涛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86 - 3

I. 明… II. 黄… III. 佛教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0960 号

### 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

黄海涛 著

---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周元晖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586 - 3

定 价: 18.00 元

---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目 录

前 言 .....	(1)
<b>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b>	<b>(7)</b>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两重性的原因 .....	(7)
第二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限制措施 .....	(14)
第三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措施 .....	(21)
<b>第二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一</b>	
——居士佛教的兴盛 .....	(33)
第一节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产生的原因 .....	(33)
第二节 佛教向世俗化发展 .....	(38)
第三节 佛儒融合——阳明心学的诞生 .....	(51)
<b>第三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二</b>	
——三教合一论和诸宗融合思想 .....	(59)
第一节 四大高僧的三教合一论 .....	(60)
第二节 四大高僧的诸宗融合思想 .....	(69)

## 第四章 由明及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

——边地佛教的兴盛 .....	(83)
第一节 蒙古地区的边地佛教 .....	(83)
第二节 西藏地区的边地佛教 .....	(86)
第三节 云南地区的边地佛教 .....	(90)

## 第五章 晚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

——“人间佛教”的兴起 .....	(121)
第一节 晚清佛教的峰回路转 .....	(121)
第二节 僧侣佛学的变革 .....	(135)
第三节 仁人志士的佛教救世情怀 .....	(143)

##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

..... (152)	(152)
主要参考文献 .....	(165)

(EE)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五函) 第一函

(8E)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第二函

(C)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第三函

二、大藏经标点本《大藏经》(三函) 第三函

(1)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第一函

(2)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第二函

(3) ..... 中国印书局标点本《大藏经》第三函

## 前　　言

对宗教的认识，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宗教仅仅是求神拜佛、念经焚香、符咒炼丹、闭关入定、祷告忏悔，甚至是坑蒙拐骗……一句话：宗教是迷信！是妖术！是骗局！而有的西方学者如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一种邪恶，是人类固有的软弱之心，是苦难的根源。康德则认为宗教就是道德；黑格尔认为宗教即是自由；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观念的历史作用是“内在的”、“心理的”，因而也就是“至关重要”、“有决定性”<sup>①</sup>的作用。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宗教是历史的钥匙”<sup>②</sup>；更有过激者，如英国著名学者麦克斯·缪勒认为“人类真正的历史是宗教史”<sup>③</sup>。中国学者梁启超先生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孙中山先生则认为：“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

② [英]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英]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最伟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马克思对于宗教有一段比较精彩的论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①</sup>“‘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的反映。”<sup>②</sup>“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sup>③</sup>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sup>④</sup>“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由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它将长期存在。”<sup>⑤</sup>以上论述说明树立科学的宗教观对于研究宗教史至关重要。

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宗教和宗教的历史，这一问题是国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3页。

内传统史学研究的一项薄弱环节，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史学’于宗教往往疏略，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sup>①</sup>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写道：“在中国著宗教史——纯粹的宗教史——有无可能，尚是问题。”<sup>②</sup> 可见宗教史长期受到冷落。但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以宗教来说明历史，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历史的真实面目被宗教所掩盖，而宗教本身又为统治者所扭曲、所利用。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宗教史。本书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来说明宗教”<sup>③</sup>，力求将神学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以此来研究断代宗教史（明清的佛教问题），进而再认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宗教为切入点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sup>④</sup> 梁启超也说：“宗教史做好以后，把国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点。”<sup>⑤</sup> 马克思科学地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sup>⑥</sup> 我们通过研究宗教来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人本身，其原因就是“宗教之所以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

①④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7月版。

②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③ 任继愈：《用历史来说明宗教——〈宗教小词典〉序》，《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版，第313页。

⑥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人为本源”<sup>①</sup>。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而佛教又是世界三大宗教（另外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一，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地域看，或者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看，它都存在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中国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佛教就是佛（即觉者）所说的言教，它的创立者是古印度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6—前486），属于释迦族，后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西汉之际，佛教随着我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而传入。关于佛教传入汉地的最初年代，尚无定论。佛教从诞生，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土壤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体系，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诸多宗派。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呈现出纵横两条主线。从纵向看，它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和兴盛衰落的变迁过程。从横向看，它的传播范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遍及整个中国大地。确切地说，纵线即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它可分依附、融合、繁荣、衰落四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译经日增，宗派初立。此时的佛教，与魏晋玄学关系密切，

<sup>①</sup>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是佛玄融和时期。各族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以提倡。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寺院林立，僧徒遍地，宗派繁多，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诸如天台宗（法华宗，空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后面详述禅宗、净土宗）等宗派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宋元佛教也得到继续发展。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后周世宗废佛），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政策来加强国内统治力量。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崛起，经历四代，至元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灭南宋而一统天下，元世祖忽必烈崇佛异常，他把喇嘛教定为国教，中统元年，他就拜八思巴为国师，后又赐号“帝师”、“大宝法王”。元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喇嘛教盛行。另外民间信仰和迷信相结合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也很活跃，以宗教作为依托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大特色。

纵观中国古代的佛教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兴衰发展。当统治者崇信佛教时，正如梁武帝“溺于释教”<sup>①</sup> 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sup>②</sup> 的佛教盛况。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和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重用玄奘、神秀、法藏、不空等高僧，因此形成了中国僧侣佛教的高峰期，形成唐代佛教宗派林立的局面。延至元代，由于元朝统治者极力推崇喇嘛教，并定为国教，喇嘛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导致宗教势力极

① 《南史》卷7《武帝纪论》，中华书局，1995版。

② [唐]杜牧：《江南春绝句》。

强。相反，当统治者压抑打击佛教时，佛教则一蹶不振，佛教历史上曾有“三武一宗”的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指后周世宗），废佛的动机不仅仅来自佛教方面，还由于寺院庄园经济的发展已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僧侣集团在政治上威胁到国家政权，以及僧侣生活腐化横行而引起统治者毁佛。中国佛教经过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限制，僧侣佛教逐渐衰落下去。

至明代，明初统治者改变以往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或崇或毁的偏激政策，采取比较适中、实用的佛教政策——既限制又利用的双重政策，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佛教自身的综合作用，随之而出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趋势，即佛教向世俗化方向发展。明清居士佛教盛行；在思想界产生了佛儒融合的思想新成果，出现了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佛儒会通的官方哲学思想和以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三教合一及诸宗融合的哲学思潮；明清边地佛教兴盛；延续至晚清，许多高僧大德、仁人志士和众多居士大力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致使佛教更加世俗化、社会化、近代化。本书将对明清佛教的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其实不然，明清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宗派林立为标志的话，那么，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什么明清佛教会继续发展呢？这就得从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谈起。

##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 两重性的原因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明初统治者也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不同：他年轻时因家贫出家当过和尚；利用明教发动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之后，采用“以儒为主，辅之以佛”的统治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外交等

领域推行既利用又限制的佛教政策，建立了全面有效的佛教管理体制。我们可以把朱元璋一生与佛教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创业前与佛结缘当和尚，创业中用佛举事成大业，创业后以佛辅佐安天下。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利用明教、发动教民起义的获利者，他亲眼目睹了摇摇欲坠的元政权被波澜壮阔的明教起义所吞没，这使他认识到宗教作为思想武器具有巨大的威力。

因此，朱元璋在明政权建立之初，就对佛教采取了既限制又利用的双重政策。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地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而佛教具有“阴翊王度”的作用和对佛教的崇信是明成祖制定佛教政策的基石和重要出发点，利用佛教为其篡权夺位服务也决定了明成祖对佛教的态度。明成祖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的政策也为后继者所沿用，影响深远。既限制又利用的双重政策，主观上只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巩固统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是否运用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如果过分强调利用，放任其发展，会导致宗教势力膨胀，结果是神权、教权高于政权，最后会使政权丧失，如中世纪欧洲建立的教皇国。如果过分强调限制打击，则会出现社会不稳定，如英国历史上镇压迫害清教徒。而高明的统治者就善于处理、平衡“利用”与“限制”，在这一点上明初统治者（以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为代表）处理得尤为恰当，

下面笔者即对双重政策作具体分析。

### 一、总结历史教训，调整宗教政策，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元代统治者在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密宗）的同时，还压抑汉地佛教（汉传佛教）及其他宗派的发展，但汉地佛教仍在民间流行。据记载：“至正四年（1338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歿，贫不克葬。……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sup>①</sup>这说明，青年朱元璋在皇觉寺皈依了佛教，后又当游方僧，周游了皖西豫东的八九个郡县，所经过的光、固、汝、颍诸州既是红巾军杜遵道的根据地，又是彭莹玉传播明教发动起义的地区<sup>②</sup>，这很自然地使他接受了明教的教义熏陶，并受到起义军的影响。从个人成长的规律来看，十七岁至二十岁是人生形成世界观的关键阶段。三年多的颠沛流离，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痛苦，目睹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丰富了对社会的认识，锻炼了勇敢坚强的性格。同时树立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思想，抱定了“普度众生”、救民于水火的宏愿。二十五岁时他便投入到明教首领郭子兴部下。

这一经历使他对佛教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重视到佞佛毁佛的危害，历史上由于佞佛亡国，毁佛动乱的事件很

① [清] 张廷玉等：《明史》卷1《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明太祖实录》卷8。

多，而朱元璋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是空相愚及世人，祸及古今，往往愈坠弥深，不知其几。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几丧天下者，周之穆王，汉之武帝，唐之玄宗，萧梁武帝，元魏主焘，李后主，宋徽宗，此数帝废国怠政，惟萧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sup>①</sup> 并告诫臣下宋濂以警示自己：“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末了一场空。”<sup>②</sup> 而且他亲眼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所产生的诸多流弊，这些流弊正是元代腐败亡国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也深知佛门内幕，了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在戎马倥偬的生涯中，他利用明教来实现他的远大抱负，打着明教的旗号来从事反元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鉴于元灭的教训和他打下江山的经验，他对佛教的态度格外慎重，制定了较为实用而又灵活的佛教政策——既限制又利用（利用之中有限制，限制之中有利用），以求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 二、发挥佛儒各自理论优势，采取优势互补原则，以加强思想统治

儒学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至明代已日趋僵化，缺乏生机，因此明初统治者极力希望完善和发展儒家理论来加强封建统治。传统儒学的理论优势在于比较重视以家长制为血缘关系的道德伦理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

① 朱元璋：《心经序》，《四库全书》别集5《朱元璋文集》，文渊阁本。

② 《明太祖实录》卷9。

(自然)人(社会)关系的考究,强调今生现实,但它不注重对人和一切生命本源、宇宙本体的探讨,缺乏对灵魂和死后世界的神学论证。儒家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为己任,追求社会生活的完善,其根本途径即《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价值目标把个人的完善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儒家实现人的完善是“尽性”,它把道德作为人的本性、本质,从而把人的完善规定为德性的完善。它认为完善的德性是天道天德的认同,并把它内化为自己的本性,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以致“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完善不是个体的完善,而是社会完善,把个体完善置于社会完善之中,尽性就是实现个体与整体、人与天、心与道的统一。

而佛学的理论优势在于它拥有庞杂的教义和丰富的哲学思想,诸如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染净、因果报应等,而且它注重轮回转世,强调对精神世界的构筑。佛家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以人生的解脱为目的,追求出世理想,它不仅否定现实生活的积极价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客观现实性,向人们灌输“苦”与“空”的观念,对现实给予消极的评价,但它又以慈悲之心怜悯众生,关怀人们的世俗生活,特别关怀人们行为的善恶价值,对人们进行谆谆教诲,积极地劝善戒恶。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摒弃一切俗念,止恶修善,以慈悲之心修持六度,坚定对佛教教义的信仰,断绝我执,弃除一切妄见,以无我心

灵待人待物，走“信、愿、行”、“戒、定、慧”的道路，获得无上妙智圆慧，超越三界，最终觉悟成佛。佛家实现人的完善是“见性”，即“明心见性”，要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本性（佛性，真如）才算见性。于是，明初统治者为了丰富和发展儒学，援佛入儒、以儒释佛就成为必然趋势，最终实现了儒学对佛学形而下的改造和佛学对儒学形而上的影响，佛、儒形成了一种互补有机的结合，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伦理化，它一方面吸收了中国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儒家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这样儒学因佛教而精深，佛教因儒学而宽广。明初统治者这样做，既将佛教思想用来为其统治服务，又改造和限制了佛教，使佛教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发展。

### 三、佛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必须实行既利用又限制的佛教政策

从统治者来说，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等都十分崇信佛教，提倡佛教。官僚士大夫和一大批文人雅士也喜欢研习佛学、参禅念佛。至于广大的下层群众，他们更是把吃斋念佛、求神拜佛当做追求来世幸福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间间低俗的信仰实践也是重要的内容，并一直在发展着，至明初更为普通，其中以观音崇拜，善书宝卷的流行和以佛教为依托的民间宗教盛行为显著标志。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记录了众多的观世音故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更是慈悲